

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

老广播人

口述历史

SMG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SHANGHAI MEDIA GROUP

节目资料中心
上海音像资料馆
MEDIA ASSET MANAGEMENT CENTER OF SMG
SHANGHAI AUDIO VISUAL ARCHIVES

学林出版社

纪念上海人民广播60周年

老广播人口述历史

SMG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SHANGHAI MEDIA GROUP

节目资料中心
上海音像资料馆
MEDIA ASSET MANAGEMENT CENTER OF SMG
SHANGHAI AUDIO-VISUAL ARCHIVE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上海音像资料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节目资料中心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730-890-4

I. 口… II. ①上…②上… III. ①广播事业-概况-上海市
②电视事业-概况-上海市 IV. G22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916 号

总 监 制

卑根源 黎瑞刚

总 策 划

李尚智 林罗华 陈金有

总 编 审

刘敬东

总 编

李丹青

主 编

王 颖 张亚敏

编 撰

肖定斌 舒 凤 余 娟 沈依谷

陈 娅 陈 雯 裘一婧

留下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

龚学平

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 60 周年,贵集团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老广播人·口述历史”的拍摄,是其中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项目。感谢传媒集团的同志们为此投入的极大热情和积极努力,祝贺你们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今天这样丰富而扎实的成果。

回顾光荣与辉煌的 60 年,上海广播人在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取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也涌现了许多优秀成果。继承并弘扬这些经验成果,是我们开拓创新的动力源泉。“老广播人·口述历史”的拍摄,不仅再现了那些充满朝气和活力、紧张而有序的画面,也真实地记录了上海人民广播 60 年的发展历程,为上海乃至中国的广播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史料价值。

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希望传媒集团的广大同志要用积累的精神财富,担当起应有的媒体责任,教育并带领团队忠诚于党的宣传事业,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和纪律作风,开拓进取,锐意改革,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使广播电视事业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人民广播的精神使我们每个广播人终生受益无穷,永远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奋力拼搏。我谨向上海

人民广播成立 60 年与“老广播人·口述历史”的拍摄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上海人民广播的明天更加辉煌！

（本文摘录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龚学平同志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 60 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暨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开通仪式”发来的贺信）

不仅仅是为了回顾

宋 超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资助是市政府投入体制和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既有开创性,也有探索性。为此,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同志多次强调,要搞好项目资助,关键是要抓住一批有影响、有亮点、有价值的好项目。通过对这些重点项目的资助,真正起到引领和导向的作用,要把资金和政策用到关键处,并产生真成效。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投入在“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年恰逢上海人民广播 60 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回顾和记录了上海广播事业不平凡的发展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为上海人民广播 60 周年献上的一份大礼。

在数字传播技术广泛运用的新形势下,“老广播人·口述历史”是挖掘和开发广播价值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我们要通过类似的工作,深入了解上海人民广播事业发展历史中,我们曾经创造出什么样的成绩,曾经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因为我们有一大批宝贵资源需要留存,有一大批经典案例需要开发,有一大批丰富的经验需要汲取。在开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今天,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弘扬奉献精神,这对广电传媒的创新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是功德无量的项目,要好好投入这样的项目。

我们现在越是强调创新、发展,就越要尊重历史、学习传统。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即传承,清泉来自源头。深入挖掘、正确把握、充分发扬老一辈广播电视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迎接挑战、突破瓶颈,并争取上海广播事业的发展是大为有益的。年轻从业人员要善于从中汲取养料,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努力拓展上海广播事业的未来。市文化发展基金会投入“老广播人·口述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而是为了继承、传承、发扬和创新。

记得在去年“老电视人·口述历史及上海电视栏目志成果发布会”上,我曾经从上海电视的成果和历史中概括出五种精神:一是把握方向,坚持发展的精神;二是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精神;三是艰苦奋斗,不断拼搏的精神;四是刻苦钻研,争创一流的精神;五是深入实际,面向大众的精神。今天我们重温这五种精神就会发现,它不仅属于创业奋斗 50 年的上海电视人,同样属于创业奋斗 60 年的上海广播人,是上海广电传媒工作者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无论是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上,或者是从精神激励的角度来看,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研究和创新,同时做好宣传,增强社会共识,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共同为上海的广播事业和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摘录自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在“纪念上海人民广播 60 周年: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成果发布会暨广播媒资管理系统开通仪式”上的讲话)

- 001 留下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 / 龚学平
- 003 不仅仅是为了回顾 / 宋超
- 001 我们还在阅读着,思考着,议论着 / 口述: 吴淞 采访: 余娟
- 009 上播音间就像上战场 / 口述: 钱乃立 采访: 王颖
- 013 广播和音乐始终贯穿着我的生命 / 口述: 徐炜 采访: 余娟 肖定斌
- 019 多年不能播出的戏终于让听众听到了 / 口述: 何占春 采访: 舒凤
- 024 凡是对工作有利的事,我都尽量去做 / 口述: 吴仲华 采访: 舒凤
- 029 有一个世界等着你们去开辟 / 口述: 邹凡扬 采访: 余娟
- 042 同志式的感情比家人还亲 / 口述: 夏之平 采访: 王颖 肖定斌
- 053 不管是什么工作,一定要勤恳去做 / 口述: 许克正 采访: 沈依谷
- 057 把大家提出的点子集中起来 / 口述: 孙桂芬 采访: 沈依谷
- 060 有些制度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 口述: 周维城 采访: 沈依谷 陈雯
- 066 没有新闻,就不能称其为电台 / 口述: 高宇 采访: 余娟 肖定斌
- 075 顺利地完成任务,我的心就踏实了 / 口述: 赵志芳 采访: 沈依谷
- 080 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 口述: 哈丽莲 采访: 王颖
- 084 这是对记者职责的一种考验 / 口述: 葛锦帆 采访: 舒凤
- 089 不能放弃一个唱得好的节目 / 口述: 赖素娟 采访: 舒凤

095 很多编辑和播音员都喜欢和我一起工作 / 口述：陆进云 采访：沈依谷

陈娅

101 我只想做一个称职的编辑 / 口述：李学成 采访：余娟 肖定斌

109 热爱就不要怕苦 / 口述：杨爱珍 采访：余娟

115 从事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 口述：龚敏芝 采访：余娟 陈娅

120 我上的是社会大学 / 口述：张芝 采访：王颖

125 那时候,我就是“小妹” / 口述：邓平生 采访：舒凤 裘一婧 陈娅

130 听众的喜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 口述：贺稚圭 采访：舒凤

137 代表时代的最强音 / 口述：黄其 采访：王颖 陈娅

147 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呀 / 口述：刘继汉 采访：余娟 陈雯

156 播音不是青春职业 / 口述：陈醇 采访：王颖

165 要让听众听清楚,听明白 / 口述：杨启民 采访：舒凤 肖定斌

171 做技术工作是一种享受 / 口述：蒋泽汉 采访：沈依谷

176 工作越多,我们就越觉得光荣 / 口述：张弛 采访：余娟 沈依谷

180 不同人的声音,我都能分辨出来 / 口述：陆玉珍 采访：沈依谷

裘一婧

184 爱若薪火,视如生命 / 口述：郭在精 采访：舒凤

190 能为听众解决问题是我最开心的 / 口述：范惠凤 采访：舒凤 陈雯

196 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一起播音 / 口述：饶钦瑾 洪慕莲 蒋荣葡

张正新 沈文娟 刘臣中

高方正 采访：王颖

陈娅

204 后记

我们还在阅读着,思考着,议论着

口述:吴淞

采访:余娟



吴淞,男,又名吴荫柏,1919年生,湖南岳阳人。1938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敌演剧队,主演话剧《长夜行》,导演夏衍剧作《愁城记》等。解放后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团长、文艺编辑部文艺组副组长,从事广播剧创作。1958年调入上海电视台,曾任节目组、电视剧组组长,编导电视剧《姊弟血》等。1992年获上海第二届银河影视文学特别荣誉奖。

问:能先谈谈您最初的革命经历吗?

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学校里开展救亡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离开北京。1938年到了武汉,我参加了抗敌演剧队。这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建的,是中共地下党建立的10个演剧队之一。我们是第九队。那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初期,政治部部长是国民党的陈诚,副部长则是共产党的周恩来。演剧队成立之初,我们这群年轻人有幸不止一次聆听过周总理精辟生动的讲话。从1938年武汉撤退一直到1943年,我都在这个演剧队里,在湖南、广西、广东巡回演出,演的是一些宣传抗战、宣传人民民主的进步话剧。我导演过夏衍的剧本,比如《一年间》,还有《愁城记》,还主演过于伶的剧作《长夜行》。

问:您是从演出话剧开始的,后来您是怎么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呢?

吴:我是1949年8月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当年电台有两个团体,一个是广播乐团。广播乐团是解放前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建的,电台成立时,就把这个乐团纳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编制。另一个是广播剧团,是当时电台的副台长要我负责组建起来的,主要是在广播里播演话剧。为此,我找到过去在演剧队认识的于伶老师。他是接管上海时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负责

人。于伶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叫欢子,一个叫梅村,都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进步剧运中的同志。于是,我们三个人就筹建了广播剧团。我们这个广播剧团,主要靠邀请电影话剧演员支撑演播。因为刚解放的时候,经费很困难。当时剧团只有我们三个人是电台的专职人员。其他都是请剧团、电影厂的演员来,一些著名演员也积极参加演播。

问:最初广播剧团演播哪些戏?

吴:我们当时主要播的话剧,是解放区的一些剧本,描写纺织工人的《红旗歌》,写农村生活的《小二黑结婚》、《大榆林》,还有历史剧《李闯王》。也播过老舍的新作《龙须沟》、《方珍珠》(此剧曾公演)。除了话剧之外,还有诗朗诵。当时苏联剧本也播了很多,有《保尔·柯察金》、《俄罗斯问题》、《望穿秋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们还播过电影剧本《乡村女教师》。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认为解放区的新天地、苏联的新面貌,应该介绍给上海听众。而一些话剧名著,比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早已盛演不衰,大家都较熟悉,可以暂时放一放。

问:你们在广播里怎样播话剧?

吴:首先要理解剧作。演员需要进入角色,用声音来创造人物形象。剧中人的动作则用话外音简要叙述。当时没有录音机,只有直播。当年的演播室很小,很多人挤在里面,灯一开,热得不得了,汗流浃背地进入角色。后来有了录音机。先是钢丝录音机,后来是苏联的三型机。有了录音机,录了音可以剪辑、复制,就有声音的组合了。时间、空间可以跳跃闪回。广播剧的特点开始显现了。简单地说,广播剧是小说的叙述,加话剧的对话,再加音乐(配音),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记得 1951 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广播剧》,提到广播剧的三要素是话言(包括叙述、对话、独白)、音响和音乐。它是听觉艺术。

问:什么时候有了广播剧的概念?

吴:以前我们只听说过广播剧。记得 1944 年我在重庆一本刊物上读过一个反法西斯的播音剧,只记得那不是话剧,有广播特点。建立了广播剧团就该去创建广播剧。我们几个人就去摸索。渐渐地,广播剧脱离了话剧,成为广播文艺中的新体裁。我们早期播了几个广播剧,比如《感谢斯大林》、《我们夫妻之间》,还有抗美援朝时期的《美国兵的日记》。

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广播剧是什么?

吴:1949 年的冬天,我们播出的《感谢斯大林》,是上海台的第一个广播剧。这个戏改编自一个短篇小说。情节很简单,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我”是哈尔滨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正遭遇警探的追捕,逃进一苏俄侨民家躲藏。主人回来发现不速之客,双方语言隔阂难以沟通。正在为难时,“我”发现墙上挂有斯

大林肖像。“我”恭敬礼拜。主人看出“我”不是坏人,与来客热烈握手。“我”激动地说:“感谢斯大林!”这是当年把领袖奉为神明、救世主的一段故事。剧中运用了多种音响,如追捕的枪声、警车的呼啸声、奔逃的“我”的喘息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对话、独白都很简明。剧尾颂歌高放,颇有圣赞感恩的意味,是我们广播剧的初次尝试。

问:早期您和伙伴们还做了哪些广播剧?

吴:接着播的是《我们夫妻之间》,小说是《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我们夫妻之间》写的是解放区的实事,有个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一个农村的女孩结婚了。婚后相亲相爱,生了孩子后才调到了一起,建立了幸福小家庭。由于出身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相互间不免有些抵牾。但还能“和而不同”。进城之后,两人的分歧就有增无减。女的看不惯城市的形形色色,发生了不少事端。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作者萧也牧写出了这农妇善良的好品质、发光的性格特征,没有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低级趣味。我们编导演,改编排练中特别注意保存发扬作者的创作意图。谁演“我”,不记得了。演农妇的是梅村。她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老演员。她用了一些俚音表现人物。小说原作的语言也写得好,比如,“我”展读家信,妻的画外音:“……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急得知不道怎么着好!……”这“知不道”恰便是北方农村口音。这戏播出后很受欢迎,纷纷来信要求重播。后来上海昆仑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导演郑君里,演“我”的是赵丹,演农妇的是蒋天流。电影公演不久就奉命停演,说是诬蔑劳动人民。我们的广播剧也不好重播。电影创作人员都挨了批。作者萧也牧的遭遇更惨。

回想当年,我觉得在选材方面还是有些欠缺。国民党时期不能播苏联的戏,上海解放了,应该让人们知道解放区的情况、苏联的情况。对于世界名著,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著名作品,我们没有播过。我国自“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曹禺的剧本,我们也没有播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只着眼于宣传要求,忽视了文学艺术对人在精神上的影响,忽视了人文、人性对人精神上的启蒙作用,当年的方向有偏颇。

问:这些反思是您后来想到的?

吴:后来才敢想。政治和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认识,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意义跟美感价值,哪个重、哪个轻,怎么样才能使之结合得更完美,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年,也是现在广播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问:早期广播剧在声音艺术方面有哪些尝试?

吴:1952年有两个戏《邵玉梅》和《三千里江山》,都是从报告文学改编的。那时候因为有了苏联的三型录音机,所以在声音上,比以前的钢丝录音机性能

更好。那年又有蔡骧从南京调来,增强了编导力量。好风凭借力,我们录制了两个有质量的戏。《邵玉梅》讲的是劳模邵玉梅为抢救国家财产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在医院里动手术。全剧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不断闪回她保护国家财产的过程。这个戏,在医院手术室里面,寂静无声,只有钟表的嘀嗒声,然后混进雄壮的交响乐旋律,表示生命的强音。《三千里江山》把听众带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当时虽然没有立体声。我记得有美国飞机轰炸鸭绿江桥的声音,有密集的高射炮声,有抢救人员、搬运物资的人声。这些声音一一展现,远近回旋,层次井然。这时的广播剧录制比钢丝录音时又进了一大步,较好地体现出广播剧声音的造型功能。中央台也播了这两个戏的录音。

问：广播剧团的主要成员有哪些人？

吴：梅村、欢子,还有何占春。何占春是 1952 年来的,是广播剧团的副团长。还有多年业余参加工作的年轻的团员陈榭、高方正、刘臣中、贾成彬陆续转正。广播剧团最早的业余团员,男的有邱岳峰、王岚、季虹、白羽、杨文元、胡庆汉、张涵、马仑,女的有苏秀、李纹、许兰,还有一些人,我记不全了。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干的。因为 1950 年初上海遇到“二六轰炸”,电台的经费更少了,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人都吸收进来,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这些同志。这些同志在当时是尽义务,只拿乘公交车的费用,那是很微薄的,跟他们的贡献是不能相比的。1954 年,中央调上海广播剧团去北京。我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何占春也没有去。广播剧团调京后,我就留在电台文艺编辑部文艺组做编辑、做副组长。

问：那时电台文艺组有哪些节目？有几位编辑？

吴：当时电台文艺组的业务范围有诗歌、散文、小说、朗诵、古诗词欣赏、话剧演出的直播或录音,还有电影录音剪辑。我们全组通力合作还创办了一个节目名为“文学艺术广播月刊”,仿效平面印刷的期刊模式,每月播出。我记得有孙道临朗诵闻一多的《红烛》,黄宗英朗诵印度泰戈尔的诗,话剧演员高重实朗诵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话剧和电影录音片段。这个月刊广纳文学艺术之精华,具有吸引力。

当年的同事令人怀念。我们的组长是向阳,他是从苏南广播台调来的党员干部。我记得组内的分工陈榭负责工人文艺创作兼管话剧、广播剧。徐荻洲编选外国文学和电影录音剪辑。编选现当代文学、诗歌、散文、小说的是两位女同志陶复平、贺先华。搞古典文学的是廖昌乐。几位编辑都具有大学、专科学历,或艰苦的革命经历。贾成彬则担当繁琐的编务工作。还有四名高中毕业来的做编辑助理。少男少女们的到来增添了编辑室的活跃气氛。我们这个编辑室总是思想畅开,议论风生,在向阳组长领导下平安度过了 1957 年。

没有一人遭“丁酉之灾”。这些都使我在1958年初下放农村时有些恋恋不舍。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同志们多已过世,向阳病弱走得早,接着是陈榭。前些年徐荻洲、贾成彬也走了。最令人悲痛的是贺先华。她在“文革”中为维护人格尊严竟以身殉!……好像我们都还在一起上班,黄浦江和煦的风吹进北京东路2号三号楼东部那间编辑室里。我们还在阅读着,思考着,议论着,编写着……

问:您在1958年10月之后就调到上海电视台工作了,是吗?

吴:我1958年1月下放在上海郊区莘庄东吴农业社劳动锻炼。这年10月上海第一个人民公社——七一公社建立后,作家杜宣下乡组织剧本创作,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就,冀望于我们这些下放者参与创作。不久得到电台人事科通知,要我去新建的上海电视台报到。电台催得紧,我考虑应服从组织决定,不可自由行动,于10月下旬去上海电视台报到上班。当时电视台是电台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有两位,一位是赵庆辉,分管技术,另一位是周峰,分管编播。他原是电影导演,由上影厂来支援电视台的,可以说是电视台的总导演。领导考虑节目的选择、编排、预告、宣传诸事应有专人负责,于是成立了节目组。播出工作包括导、摄、美、光、录等工种,建立了演播组。那是“大跃进”年代,强调突出政治,当时全台只有三十余人,党员占一半以上。我是1956年入党的,所以也把我调来了,我这新党员需要接受新的考验。

问:很快就上手做节目了吗?

吴:我见习了几天,播出节目时,让我做切割。在导控室坐在导演旁,听导演令下按动按钮,切换三架摄像机从演播室送来的图像,从而熟悉镜头的调度使用,这是电视的基本功。上手做节目那得等我多学学之后吧,很快是不可能的。不久,朝鲜首相金日成访华抵达北京,12月初访沪。领导要求做个节目迎接贵宾的来访,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诚惶诚恐。赶忙去资料室找素材,发现报刊上有一篇通讯稿,写志愿军一战士遭敌炮轰炸负伤,一位朝鲜姑娘为他输血,救活了他的生命。我立刻把它编成一个



吴淞 1961年

短剧,称作电视报道剧《姊弟血》。由沈西艾演姊,王宗尧演弟。他们都是上戏表演系五七届毕业生,还有李尚奎、周宝馨、许诺、江波。他们都主动投入这项突击任务中来,给我帮助甚多。在新永安大楼13楼那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室里,搭了两三个景。为了隔音,门窗紧闭,灯光再一烤,排戏时,姊弟二人汗流不止。我说,这怎么行?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地怎么可能流汗!他们说,你放心,播出时绝不会出汗。原来他们已有演电视剧的经验,电视不是舞台,在出

镜前,他们可以把汗吸干。我还记得输血那场戏的处理。画面:朝鲜姑娘正在为志愿军伤员输血。画外音男声:“她,好像见过……我们进村时,她们来欢迎,歌舞队里有她……”切入朝鲜姑娘们的合唱群舞(电影资料片)。画外音女声:“这个中国兵见过的,是那个排头兵,他还向我们行军礼感谢我们的歌舞。他的脸涨得通红。……可现在……我情愿,用我的血让他再红起来……”(画外音中输血镜头与歌舞欢乐场景资料片交错显隐)。靠各工种的配合,播出很顺利,这是我创编的第一个电视节目。至今使我不忘的是,王宗尧、沈西艾的表演很生活化,逼真、自然、亲切,没有舞台表演的痕迹。当战士听说朝鲜姑娘给他输了血,宗尧在特写镜头里颤动眉睫,那激动的泪眼感人至深。以后我们又合作过《百合花》,西艾饰演的农家新媳妇,在月光下把她的百合花被子盖上小战士的躯体,她哀伤的面容和百合花的叠影常闪回于我的心目。西艾好像心有灵犀,她总能和她演的人物心心相印。用“灵心慧质”赞美宗尧和西艾的为艺为人,我觉得都是恰当的。他们美好的荧屏形象常在我记忆中回放。

问:当时你们怎样来提高业务能力呢?

吴:那时我们节目组编辑的力量实在薄弱,比起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还有差距,广播电台新闻编辑部、文艺编辑部都有曾在报社当过编辑记者的,也还有大学新闻系、中文系毕业的。我们编播部门文化水平偏低。我觉得要当好编辑,首先是要学习好,就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如要请人来讲课,得花钱,可是没有这一项经费。就把我们电台戏曲组的组长何占春请来讲戏曲,音乐组组长屠咸若讲授音乐广播。可惜由于忙,他们都没能来多讲几课。我也讲过古典文学,因为我对古典文学有兴趣,我是现买现卖,稿子脱不掉的。我那不是讲稿,是我的学习笔记。因此我期望我们编播部门的人都能养成读书的习惯,因为唯有丰富学识,才可能提高业务能力。

问:早期您还做了哪些节目?

吴:1960年初全国继续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传媒都在密切配合这一运动,电视岂能落后。有两个节目是我搞的,一好一坏,一成一败,还真忘不了。先说失败的,我在报上看到有个糊纸盒的里弄小厂,搞了技术革命后,从手工劳动转为机器生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减轻了劳动强度,我就去采访。原来那都是粗糙的木制机器。我先了解了生产程序。再采取电视记者提问、工人边操作边回答的方式、顺序播出。事先还写了对话的要点作为备忘。播出那天上午,转播车开进了小弄堂,三架摄像机都推进了厂房,把用机器制盒过程一一摄成图像送出。下午排练了两次,使问答者都记住要说的话,能对答如流。当晚就正式播出了。播出也还顺畅,没有发生差错。可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失败了呢?由于不久得知该厂的木制机器已拆除,仍然恢复了

原来的手工操作。过了些时间再去看,仍是老样子。这真是上当受骗了!我懊悔真不该做这档节目。当年这种弄虚作假的浮夸风盛行又何止一家,报看电视怎么能紧跟配合啊!再说说一个“机械制图”的知识讲座节目。我请来了同济大学的几位青年教师,他们连续、通俗地讲授机械制图课程。播出后立即收到不少电话来信,反馈良好。有的说,这个讲课指引我们工人怎样搞技术革命。有的要求重播。有个厂的工会同志说,只有学会制图,有了图纸,经工程师鉴定后再上马,这样可防止盲目性,避免浪费,使技术革命走上正轨。上述这两个节目,好就好在尊重科学,讲授科技知识;坏就坏在盲信盲从,违背科学。给我的教训是,做一个合格的电视节目编辑,的确应该多学习,勤思考,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电视录像的?

吴:那是“十年动乱”以后70年代末了。记得我编了一个本子,根据小说改编的。故事说的是某远洋轮二副林浩与某中学女教师舒侨相识、相爱而结婚,并育有一女。婚后,两人事业家庭都很美满。却不料“十年动乱”大难来临。舒侨直言上书,望上级匡正时弊,挽救教育危机,却被视为“恶毒攻击”,被判10年徒刑。此案波及已升任船长的林浩,上级指示他与舒侨划清界限,脱离夫妻关系,他面临艰难的选择。最后因不堪重压,选择与素不相识的女工曲素芬再婚。舒侨则毅然作出服刑入狱的选择。“十年动乱”结束,查明纯属冤案,舒侨无罪释放。她思念女儿来到林家,女儿却只把养母当生母,善良的素芬把真相告诉了孩子。母女紧紧相抱离开了林家。林浩仰天长啸,悲痛欲绝。

问:这就是电视剧《选择》吧?

吴:是的。这戏像是古老的反封建专制的悲情戏,却是一出反映“十年动乱”时期的婚姻悲剧。原是一篇短篇小说,《解放日报》“朝花”上发表的,作者署名士敏。他是一位远航局的干部,一个颇有才华的业余作家。他到电视台来,我们见过面,他说小说中的人物故事都有现实依据的。我们又很欣赏党报的慧眼有识,及时发表了《选择》。他们都做了解放思想的表率,令



吴淞在电视剧《济公》中饰演少年
济公的师傅的造型